



儒家的民本思想及其当代(陈增辉)

(2005-7-15 10:21:12)

作者：陈增辉

综上所述，中国的民本思想滥觞于商周，形成于战国。进入封建社会后，随着统治阶级和人民群众矛盾斗争的起伏，民本思想也随之上下波动。从中似可以看出一个带规律性的现象：大凡一次大的农民起义后，必然出现民本思想在理论上的新高潮，迫使新的统治者采取“与民休息”的政策，导致生产力的恢复和发展、人口的繁衍、经济文化的繁荣，从而出现一个太平盛世。在盛世中，一些统治者（尤其是在深宫中长大的一代）忘乎所以，淡化或根本抛弃民本思想，鱼肉百姓，迫使人民揭竿而起……如此循环往复，推动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。其中有代表性的是：秦末农民大起义——第一次民本思想高潮——文景之治；隋末农民大起义——第二次民本思想高潮——贞观之治；明末农民大起义——第三次民本思想高潮——康乾盛世。这种反复出现的、惊人的相似现象，能否算一种规律？当需深入研究。笔者暂且作如是观。

恩格斯说：“德国的工人运动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者。”（《路德维希·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》）同理，中国的工人运动是中国古典哲学的继承者。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，继承和发展了包括民本思想在内的传统政治学中的精华，使自己完成了由民本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。青年毛泽东也曾是个民本主义者。如1910年秋，他写下了以下批语：“正式而成立者，立宪之国家也。宪法为人民所制定，君主为人民所推戴。不以正式而成立者，专制之国家也，法令由君主制定，君主非人民所心悦诚服者。前者，如现今之英日诸国；后者，如中国数千年盗窃得国之列朝也。”（韶山纪念馆藏《新民丛报》第四号。影印件）可见，在君民关系上，毛泽东主张君主应“为人民所推戴”，为“人民所心悦诚服”；否则，即为“不以正式而成立者”（意即不合法者）。显然，这里带有孟子、谭嗣同民本思想的印记。1917—1918年，他在阅读泡尔生的《伦理学原理》时写的批注中说：“人类皆为圣人”，“圣人者，抵抗极大之恶而成者。”（《毛泽东早期文稿》第186、183页）人人皆为“圣人”，普通人只要能“抵抗极大之恶”也能成为“圣人”；又说：“圣贤豪杰之所为，即当认为普通人之所为。”（同上第237页）这样，就填补了“圣贤豪杰”与“普通人”之间的鸿沟。1918年10月，毛泽东来到北京大学图书馆，在李大钊身边工作了4个多月，参加了北大哲学和新闻学研究会等进步组织，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教育。五四运动后，他主编《湘江评论》。在创刊宣言中，他指出：“世界上什么问题最大？吃饭问题最大。什么力量最强？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。”（同上，第292页）此后，他以《民众的大联合》为题，连续发表了3篇文章，全面阐述了民众大联合的可能、必要和方法。1919年底，毛泽东第二次到北平，李大钊向他推荐了大批马克思主义书籍。其中的《共产党宣言》等3本书特别深刻地铭刻在我的心中，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。……到了1920年夏天，在理论上，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，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。”（引自埃德加·斯诺：《西行漫记》）1921年1月，毛泽东在《致蔡和森》的信中明确指出：“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。”（《毛泽东书信选集》第15页）到此，毛泽东完成了由民本主义者到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，确立了“人民，只有人民，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”（《论联合政府》）的群众史观。这样，才有我们党的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”的根本宗旨以及群众观点、群众路线。

综观全文可见，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与马克思主义“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”原理，反映的是两种不同的经济基础，因而是两种性质不同的理论，这是显然的。但是，同样明显的是：第一，民本思想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，以特定的方式说明了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，这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是相通的。所以，第二，在中国，民本思想成为唯物史观赖以生根、发芽、开花、结果的文化土壤，在我党的老一辈革命家中有很多人（毛泽东只是其中的代表），都是从民本主义出发，接受马克思主义，在革命实践中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。这就说明：儒家的民本思想是中国近代民主主义、以至无产阶级民主思想赖以产生和发展的深厚文化土壤；在当前，则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思想资料。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指出：“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，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。”“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。”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“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，总结自

己的实践经验，同时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。” 儒家的民本思想，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赖以出发的重要文化国情，是中华儿女“自己的实践经验”，是必须借鉴的“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”之一。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过程中，一定要对儒家的民本思想进行扬弃，在剔除其封建性糟粕的同时，吸收其民主性精华，作为实现“人民当家作主”的重要借鉴。如前所述，孟子曾说：“得乎丘民而为天子，得乎天子为诸侯。”对此，朱喜注道：“丘民，田野之民，至微贱也。然得其心，则天下归之。天子至尊贵也，而得其心者，不过为诸侯耳，是民为重也。”丘民，就是农民。如果能得农民之心，就能得天下。说明得农民之心的极端重要性。这在2000多年前的中国是真理，在当代中国仍然是正确的。邓小平同志早就指出：“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住在农村，中国稳定不稳定首先看这百分之八十稳定不稳定。城市搞得最漂亮，没有农村这一稳定的基础是不行的。”稳定是这样，政治文明建设、人民当家作主也是这样。现在，我国的农村人口还占总人口的62%。如果这些农村人口的政治文明建设搞得不好，农民不能真正当家作主，那么，城市居民的政治文明建设搞得再好，城市居民再当家作主，整个国家的政治文明和人民当家作主也是缺乏坚实基础的。仅此一例，已足以说明有的当代意义。

[\[第 1 页\]](#)

[\[第 2 页\]](#)

[\[第 3 页\]](#)

[\[第 4 页\]](#)

[\[第 5 页\]](#)

[\[关闭窗口\]](#)